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第 7 期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高校权威社科期刊
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入选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 (AMI) 核心期刊

(总第 336 期) 月刊

Modern Communication

现代传播

Modern Communication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4 第 7 期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高校权威社科期刊
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入选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 (AMI) 核心期刊

现代传播

Modern Communication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7 期 (第 46 卷总第 336 期) 月刊

1979 年 9 月创刊

编委会主任 / 廖祥忠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杰	王栋晗
王晓红	仲呈祥
张 晶	李怀亮
张鸿声	张树庭
周月亮	周 涌
胡智锋	荆学民
高晓虹	段 鹏
黄升民	贾秀清
隋 岩	黄心渊
雷跃捷	鲁景超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1979 年 9 月创刊

来稿要求

1

本刊欢迎作者以电子邮件方式投稿。
编辑部的唯一投稿邮箱：
journalcuc@163.com。

2

来稿内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
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
等；作者工作单位和职务职称；
作者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
电话和电子邮箱。

3

来稿篇幅 8000—20000 字均可，
行文层次符号用—（—）1.（1）。

4

本刊引用采用文尾注释，注释格式
参考 CY/T 121—2015 标准，注释
序号排列请使用 Word 插入尾注功能
并自动排序。

5

本刊欢迎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
的研究成果。凡获基金资助的
论文，请在首页注明基金项目
的来源、名称和编号。

6

来稿请务必遵照本刊格式要求，
以增加用稿几率和减少稿件采
用后的修改工作。



目 录

★“七一”特稿

重庆《新华日报》践行“群众路线”的缘由、路径与价值

孙 江 刘岳麓 / 1

★新闻学与传播学

作为关系拓扑的手机地图：技术、空间与文化三重维度的透视

赵红勋 王 飞 / 12

纸媒依恋：物质性与像似性观照下的纸书阅读价值分析

谢妍妍 / 21

来华留学生中国社交媒体使用与文化适应研究

杨凤娇 蒋欣雨 / 30

“自主性”的再审视：流动老人互联网代理使用机制及其影响

熊 慧 柴 旭 / 41

★国际传播

中华文化短视频国际传播效果的组态效应研究

——基于 YouTube 平台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陈 刚 刘灿威 / 50

信息地缘政治博弈中跨国数字平台舆论风险的成因与应对

——以 TikTok 遭遇的多起国际制裁事件为例

陆泓承 郑苏晖 / 59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

戏剧中的共和观念：“布鲁图斯”在 16—18 世纪英国与

法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苏 颖 田央央 / 67



现代传播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4 年第 7 期
(第 46 卷总第 336 期)

本刊声明

★传媒艺术

文生视频技术如何影响影视创作与审美接受

——以皮尔士三元模型为框架

张蓝姗 方格格 / 80

从 1 到 N: 中国电视节目演化博弈论

陶 冶 / 89

发现青年: 回应当代乡村的现代化焦虑

——以农村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

沙 垚 杨文根 / 100

天涯若比邻: 短视频与可体验的共同体

张丽华 唐润华 / 109

流媒体平台的国际竞争优势建构

——以网飞出海韩国为中心的考察

邓又溪 刘波洋 / 117

★新媒体研究

从个人情感到文化认同: 豆瓣平台卡带趣缘群体的

技术怀旧与媒介记忆书写

邓秀军 李雅莹 / 125

数字内容平台公共价值传播逻辑

任 慧 李春雷 / 135

社交媒体的中医传播交互效应之实验研究

陈 梦 刘 可 / 144

具身主体的文本化: 由“虚构之我”到“虚构之他”

江 怡 / 152

负责任计算: 计算广告的伦理转向

王 水 / 158

1

本刊已入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多家期刊数据库,并将同步发布微信版。如不愿刊入以上电子出版物者,请提前书面声明,以便处理。

2

编辑部有权对来稿进行文字和技术性修改,文中学术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剽窃及一稿多投,如若查实,本刊将拒绝该作者所有投稿。

3

本刊恕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凡投稿后三个月未见用稿通知者,请作者自行处理稿件。本刊不对未采用稿件提出修改意见,敬请谅解。

4

本刊刊登的文字、图片作品,未经许可和授权,不得做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登。如需转载,请联系编辑部,电话: 010-65779586。

5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本刊从不收取任何版面费、审稿费以及其他名目的费用。根据要求,特刊登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欢迎监督。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Vol.46 No.7(Serial No.336) Jul. **2024**

Main Contents

——Reasons, Paths, and Values: the "Mass Line" Practice by Chongqing's *Xinhua Daily*

Sun Jiang, Liu Yue-lu / 1

——Mobile Map as a Topology of Relations: A Perspective through Technology,
Space, and Culture

Zhao Hong-xun, Wang Fei / 12

——Configurational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Short Videos on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ouTube Platform

Chen Gang, Liu Can-wei / 50

——Republican Ideas in Drama: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Brutus" in England and
France from 16th to 18th Century

Su Ying, Tian Yang-yang / 67

——Impact of Text-to-Video Generation Technology upon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and
Aesthetic Acceptance: Using Pierce's Triadic Model as a Framework

Zhang Lan-shan, Fang Ge-ge / 80

——From Personal Emotion to Cultural Identity: The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and Media
Memory Writing of the Cassette Tape Enthusiasts Group on Douban Platform

Deng Xiu-jun, Li Ya-ying / 125

现代传播

Modern Communication

主管单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单位 /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编辑部

主编 / 隋岩

副主编 / 张国涛 潘可武

编辑部主任 / 刘俊

责任编辑 / 张国涛 潘可武 刘俊 杨旭东 张毓强 (特约)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 / 100024

电话 / (010)65779586

邮箱 / journalcuc@163.com

国内发行 /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读者订阅 /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 2-753

国外发行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代号 / BM3872

印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网址 / <https://periodical.cuc.edu.cn/>

定价 / 30.00 元

ISSN 1007-8770



ISSN1007-8770(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CN11-5363/G2(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信息地缘政治博弈中跨国数字平台舆论风险的成因与应对^{*}

——以 TikTok 遭遇的多起国际制裁事件为例

—
陆
泓
承

郑
苏
晖
—

【内容摘要】 近年来,跨国数字平台面临的舆论风险越发频繁、复杂,仅凭传统的商业、文化框架已经较难解释其风险来源,也难以帮助平台真正走出危机。从 TikTok 在各国所遭遇的多起事件来看,各国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对 TikTok 开展制裁的核心诉求主要聚焦于立场表达、控制与制衡平台权力等政治原因,这也决定了解读和分析跨国数字平台国际风险的基本框架。在信息地缘政治理论的视野之下,舆论手段之所以在制裁中会受到如此重视,一是因为其与传统制裁手段相比能更有效地打击平台的信任基础,二是因为其对于多方主体也更具可用性和便利性。然而,在信任博弈背后,事件反映的实质是平台模式垄断性和公共性的二元对立矛盾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背景下的进一步激化。未来应对风险需要充分认知风险来源,重视和巩固平台信任资源,革新跨国数字平台的所有制形式,积极推动跨国数字平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跨国数字平台;信息地缘政治;科技制裁;TikTok 事件

DOI:10.19997/j.cnki.xdcb.2024.07.012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平台越来越容易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关注对象。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边境摩擦中,中国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各国政府对 TikTok 不仅表现出高度关注,对其进行打压的方式也呈现出了更高的复杂性、持续性和不可预测性。

在各事件中,舆论场也成为了国家之间进行博弈的重要场域。有研究发现,印度、美国的主流媒体在事件中对于 TikTok 的报道无论在情感、议程上均出现了明显的负面转向。^①同时,在公开场合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等外国政商人士在事件中多次对于 TikTok 进行公开的污名化建构,以图引发对于 TikTok 的负面舆论,这也给平台的国际化发展与全球化经营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然而,即使 TikTok 官方在事件中及事件后通过产品优化、发布隐私报告等多种方式对于自身的形象进行修复,但直到 2024 年,美国仍然通过政府公告、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对 TikTok 的形象进行持续性打压和污名化建构。同时,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欧盟等更多的国家和政体也开始决定对 TikTok 进行打压和限制,这也给 TikTok 乃至所有源自中国的跨国数字平台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从现实来看,TikTok 所遭遇的多起事件本身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品牌危机和文化冲突,简单

^{*}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视频化对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创新的赋能研究”(项目编号:AMRC2022-14)的研究成果。

地以商业、文化框架对其进行解释已经难以帮助其脱离危机,^②站在更为宏观、综合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才能更充分地理解其面对的威胁和风险。因此,本文从信息地缘政治视角出发,重点以 TikTok 及其在各国面临的危机作为案例,探究跨国数字平台在信息地缘政治当中的地位以及舆论手段在博弈中受到重视的原因。

二、“政企摩擦”事件的定性与各国制裁的根本诉求

部分研究将 TikTok 等跨国数字平台所遭遇的“政企摩擦”事件归因于商业、文化、法律等原因,并主张平台需要从自身出发、通过非政治性手段走出困境。然而,以 TikTok 所遭遇的多起制裁事件来看,各国对于跨国数字平台的制裁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性特征,这也给跨国数字平台所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确定了基调和边界。

(一)各业务所在国“政企摩擦”事件的共性与本质

本文整理了 TikTok 在各个国家中所遭遇的主要“政企摩擦”事件(如表 1 所示)。从时间上看,各业务所在国对于 TikTok 的制裁具有较强的集中性和非连续性,大部分事件基本都发生在 2020 年和 2023 年,而其中绝大多数不只是常规性处罚,而是具有较强目的性和意图性的制裁。此外,以各国既有法律框架对于跨境信息保护的力度来看[研究主要参考 ECIPE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发布的数字跨境限制指数(Digita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DTRI)作为线索,用以考察特定国家对于跨境数据的保护力度],在制裁 TikTok 的国家中不仅有英国、新西兰、挪威等对于数据跨境限制较少的国家,而且现实中大部分国家对于 TikTok 的制裁基本上也超出了各国当前的法律框架。可见,虽然 TikTok 所遭遇的制裁是发生在业务所在国政府与跨国企

业之间的摩擦,但制裁的动机绝不仅仅只是指向各国政府所说的“隐私保护”“价值观冲突”等表面原因。即使 TikTok 官方从 2020 年开始就积极通过设立监管委员会、分离和迁移服务器数据、成立信任与安全团队、更改股权结构等多种方式以达到各国的合规标准。但直到 2023 年,上述各国对于 TikTok 的警惕和制裁不仅丝毫未减反而还更为严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从商业、法律框架对平台所遭遇风险的解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适用性。

从国家范围来看,参与制裁的国家在时间、空间上均存在着较强的协作性、跟随性和集中性。特别在 2023 年,大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跟随着美国开始对 TikTok 进行制裁,这事实上也与过去各国对于华为、5G 等中国前沿科技创新所进行的科技制裁之间有着较强的相似性。^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的制裁中,大量国家基本上仅仅只采用了政府内部封禁、特别审查等制裁力度较弱的政策工具来对于 TikTok 进行制裁,并无意对于 TikTok 在本国的业务进行根本性、实质性的打击,这也侧面反映了制裁本身的目的:对于大量国家而言,实施制裁更多起到的是信号传递作用,而非惩戒、强迫遵守等其他传统的制裁目的。因此,透过这一逻辑来看,“政企摩擦”的本质实则仍然是国与国之间的摩擦,背后的政治性目的已经十分明晰,解读 TikTok 所面临的危机也有必要从政治框架来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

(二)各业务所在国制裁 TikTok 的核心诉求

为了进一步挖掘各国制裁 TikTok 的核心诉求和关键动因,研究梳理了 2023 年期间 TikTok 各业务所在国对于平台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和手段(如表 2 所示)。

一方面,参与制裁的国家与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之间具有极强的同构性,各国的制裁措施背后体现了较强的政治考量。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盟友在

本次制裁中均较积极地跟随美国对于 TikTok 开展制裁,欧洲、亚太地区的盟友和美国的制裁措施之间更是呈现出了较强的时空伴随性。相反,对于如巴基斯坦等与中国关系较为紧密的国家,虽然出于保护本国中小企业、价值观冲突等原因,其本身也存在着较为强烈的制裁和限制 TikTok 的意愿和动机,但其制裁过程整体上反而存在着多次反复和犹豫,显然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可见,地缘政治、同盟压力等国际政治原因是各国选择是否、以及如何制裁 TikTok 的重要决策路径之一,这一方面揭示了信息科技领域在地缘政治博弈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从现实否认了技术乐观主义对于信息消解地缘政治的预言。虽然跨国数字平台能做到用户、数据和经营的去地域化,但是平台的算法归属、运营主体仍有明确的国家背景,这也使其不仅无法真正消解地缘政治,反而还会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设施化而导致平台的发源地议题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更为突出。

表 1 TikTok 在各业务所在国所遭遇的“政企摩擦”事件

时间	发生国家	DTRI	官方制裁措施	发生缘由	是否仅针对 TikTok
2020 年	韩国	0.31	罚款	儿童隐私	是
2020 年	印度	0.44	封禁	所谓国家安全	否
2020 年	美国	0.26	强制分拆、拟禁用	所谓国家安全	否
2020 年至 2022 年	巴基斯坦	0.33	多次封禁	所谓国家安全	是
	美国	0.26	公职人员禁用听证会	所谓信息安全	是
2023 年	加拿大	0.23	特别调查、罚款、公职人员禁用	所谓信息安全	是
2023 年	英国	0.19	公职人员禁用、罚款	儿童隐私数据安全	是
2023 年	比利时	0.22	公职人员禁用	隐私/虚假信息	是
2023 年	新西兰	0.09	公职人员禁用	隐私/虚假信息	是
2023 年	挪威	0.13	公职人员禁用	隐私/虚假信息	是
2023 年	丹麦	0.22	公职人员禁用	隐私/虚假信息	是
2023 年	法国	0.36	政府禁用、罚款	隐私/虚假信息	否
2023 年	爱尔兰	0.13	政府禁用、罚款	隐私/虚假信息	否
2023 年	荷兰	0.17	公职人员禁用	所谓信息安全	是
2023 年	澳大利亚	0.23	公职人员禁用	所谓信息安全	是
2023 年	新加坡	0.20	公职人员禁用	所谓信息安全	是
2023 年	土耳其	0.38	考虑禁用、罚款	社交媒体安全	是
2023 年	印尼	0.43	禁止电商业务	保护中小企业	是
2023 年	越南	0.41	特别调查、罚款	隐私保护	是
2023 年	尼泊尔	/	全国封禁	安全	是

表 2 各业务所在国对于 TikTok 所采取的官方制裁措施汇总(2023 年)

制裁强度	制裁措施	国家
强力制裁	全面封禁	巴基斯坦(反复封禁但多次解禁)、美国(蒙大拿州)、尼泊尔
	封禁特定业务	印度尼西亚(仅封禁电商业务)
有限制裁	罚款与特别审查	爱尔兰、土耳其、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越南、加拿大
	政府/议会内禁用	新加坡、美国、英国、新西兰、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
不制裁与弱制裁	考虑禁用	菲律宾、马来西亚、意大利、日本
	未采取制裁措施	以色列、罗马尼亚、巴西、西班牙、墨西哥、意大利、韩国、瑞士

注:统计根据新闻报道等公开资料整理,时间截至 2024 年 1 月 28 日

另一方面,各国对于 TikTok 的制裁也反映出了一定的矛盾性,各国一面反映出了制裁的紧迫性和集中性,但另一面又难以直接、彻底地完全封禁 TikTok。在过去的贸易制裁、商业制

裁中,特定的主权国家可以通过较小代价对于特定跨国企业进行限制和打击。但在对 TikTok 的制裁中,由于 TikTok 本身具有基础设施化的特征,跨国数字平台不仅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资本、就业等传统资源,同时还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数据信息、数字劳动和网络入口等信息资源,国内可替代平台较少的国家则较容易对平台形成非对称依赖。^④同时,跨国数字平台具有数字基础设施属性,同时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可以通过意识形态输出、发动舆论等方式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等国家主权根基造成影响。在脸书与澳大利亚政府之争^⑤、俄乌冲突^⑥、巴以冲突等事件中,部分跨国数字平台更反映出了超主权的实力,甚至可以通过反制裁、自我制裁等手段胁迫特定国家政府实现自身目的。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政府必然会对于跨国数字平台形成警惕,也很容易通过安全框架去认知和处理他国数字平台。但受限于非对称依赖关系,其实大部分国家也无法完全封禁已经取得一定规模的他国平台。^⑦由此可以推论,国内可替代数字平台相对较少、对于平台经济高度依赖的国家基本上很难直接对于 TikTok 进行彻底和完全封禁;相反,对于 TikTok 依赖不高的平台,要么可以较为直接地选择封禁平台(如巴基斯坦、尼泊尔),要么对跨国数字平台并不会形成过大的威胁认知(如日本、韩国)。可见,平台也天然地创造了新的权力争夺空间,这也使得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内在的制裁他国数字平台的驱动力。

综上,业务所在国之所以会和平台之间形成“政企摩擦”,实质仍然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锋。跨国数字平台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意识形态载体,其本身不仅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国际霸权的新竞争场域。TikTok 的案例进一步验证了丹·席勒(Dan Schiller)所描绘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图景。^⑧在这一逻辑下,各国对于 TikTok 开展制裁的动机也更为明晰:一

是传统地缘政治逻辑下的政治立场表达与对于同盟压力的响应,二是信息地缘政治逻辑下对于平台超主权的警惕和制衡。更进一步来看,这背后反映的仍是大国博弈背景下不同阵营对于平台控制权和信息数字资源的竞争,可见制裁措施的实施并非简单的政策决定,而是深层次国际关系动态的直接体现,是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增强国家话语权以及在全球舞台上确立领导地位所采取的战略举措。

三、舆论手段制裁跨国数字平台的有效性和可用性

在对 TikTok 开展制裁过程中,各国往往会通过污名化、意识形态化等舆论手段来辅助官方政策的开展和实施,舆论战、污名化等手段在部分国家中甚至成为了相当重要的制裁措施之一。^⑨回归到理论层面,之所以舆论手段会受到如此重视,一是因为其确实有助于实现各国制裁的核心目的,二是因为其也是各国政府所能采用的最具可用性的非官方政策工具之一。

(一)舆论手段制裁跨国数字平台的有效性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战争等军事手段可以帮助国家获取地理意义上的权利空间,关税、限额等经济手段可以帮助国家获得经济层面的权利空间。然而,由于数字平台(特别是跨国数字平台)本身并不存在着物质实体,而且其核心资源存在着较强的分散性和去地域性,再加之目前国际上对于信息和数据的确权仍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事实上很难取得“制平台权”^⑩。从军事手段上看,一个国家很难说可以“占领”某个跨国数字平台,或是通过军事手段“摧毁”某个跨国数字平台;从经济手段上看,由于跨国平台本身具有极为复杂、多元的所有权、用户和数据结构,因此,特定国家事实上也很难在实践中对于某个特定的平台设定看似合理的关税和配额;从科技手段上看,平台能否发展壮大并不完全取决

于平台科技水平的高低,产消者层面上的平台生态等因素也起着更大的作用,仅仅只是采取“军备竞赛”的思维去盲目地提升科技水平,这实际也没有意义。

然而,舆论手段却能对于数字平台造成关键性影响。平台经济的核心在于用户之间的相互连接,而维系这一点则需要用户对平台、用户与用户之间形成充分信任。也正是在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一次次正反馈互动之中,平台价值才能持续产生。^⑪然而,舆论手段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影响和挑战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信任。当信任危机产生时,平台价值的正循环就有可能被打破,用户很有可能会流入到其他类似功能的平台当中。而当用户流失超过一定阈值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将通过负反馈循环进一步加速平台的灭亡。^⑫

目前,搭建平台并不存在过高的技术壁垒,平台商业模式的确权也存在较大的灰色地带,炒作、攻击他国平台还能为本国平台创造一定发展机会。因此,站在非来源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本国存在着可以承接他国平台流失用户的平台,那么危机事件不仅会将他国平台已有的数据、用户、人口等多方面资源转移到本国平台,宏观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数字霸权和平台实力。因此,在美国的封禁事件当中,TikTok的竞争对手 Meta、YouTube、Instagram 等美国老牌的社交平台均在事件声量最高的时机在产品中添加了短视频功能,希望能够把握机遇,借势承接 TikTok 封禁所流出的大规模用户群体;印度在 2020 年封禁 TikTok 之后也在国内推出了多款功能相似的平台,以图承接 TikTok 在印度市场所流失的用户。另外,由于平台模式的核心为价值共创模式,平台官方对自身形象的控制力本身就相对较弱,异国语境更加剧了其进行形象管理和企业公关的难度,这使得舆论冲击对其所产生的效力变得更为严峻和难以磨灭,因此,跨国数字平台所面临的舆论风险将会超出传统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互联网平台。^⑬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立场表达、形成联合制裁本身也是各国政府对 TikTok 进行制裁的重要诉求之一,舆论的“武器化”不仅有助于帮助各国政府在国内合法化自身跨法律框架的官方措施,同时还有助于在较低的制裁成本和反制风险下参与到制裁阵营当中。在当前的大国博弈背景下,科技领域逐渐形成了多边化、阵营化趋势。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实施制裁的优势条件,甚至部分中、小型国家对于跨国平台反而还存在着较强的反向依赖,因而不宜真正采取实质性的制裁行动。政治价值观与安全保障是当前西方国家联盟形成和维系的核心支柱。污名化、意识形态化对立阵营平台,将平台形象从商业框架强行转移到安全框架,有利于塑造阵营的共同“敌人”,从而合理化有关制裁政策,加强和巩固阵营关系。而且,由于国际舆论具有扩张性和网络化特征,其本身也具有放大阵营声势、扩大制裁协作的功能,阵营化和联盟化的舆论氛围也会形成阵营合势,从实质层面增强制裁强度、扩大联盟凝聚力。

(二)舆论手段对于各主体的可用性

通过舆论手段影响平台具有实际效力,这是舆论手段成为信息地缘政治中各方选择的充分条件。但舆论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其是各方主体可用性和可行性最强的手段之一。

从根本上看,多方围绕着平台所展开的舆论博弈本质上是信任博弈,各方博弈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跨国数字平台用户对于平台的信任,包括舆论战、污名化等博弈手段。从 TikTok 所遭遇的多起事件来看,参与到舆论战的大部分主体基本上都是社会信任体系中的关键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政客、媒体、意见领袖等。

从跨国平台输出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主体在国内均已获得了一定的信任资本,而这也正是其能与他国跨国数字平台之间形成博弈和对抗最关键的竞争筹码,这也构成了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话语(甚至是污名化和谣言)提高可信度和实现有效性的基本条件。而且,由于地理接近性优

势,这些主体本身就对本国人民有着更高的影响力和信任获取能力,其在博弈当中也能够更灵活、有效地影响舆论。因此,这也是这些主体为何能够在这些事件当中表现得更为积极、政府为何更愿意操纵和裹挟这些主体的重要原因。

而且,舆论手段本身对于这些主体而言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额外收益。对于政府和政客,炒作事件不仅能影响平台的信任根基,炒作行为本身也能为其争取到政治资本和信任资本。在炒作过程中,政府和政客可以借此进一步展现和表明自身的态度和立场,借以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还能在过程中与特定的政策工具之间形成联动,从而为推行某些政策铺路。对于媒体和竞对平台而言,大部分的他国数字平台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媒介属性,对于居民的注意力存在一定的分流效应。对于一些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分流效应无疑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行业冲击。事实上,这样的对立关系也推动着被输出国的媒介产业天然地就会对于他国的数字平台存在一定的敌意,产生对他国平台进行打击的动机。

(三)舆论手段对全球整体效益的影响与反思

从宏观的全球视角回到舆论博弈的本质来看,用户对于不同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信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博弈的结局也并不一定要以零和博弈收尾。虽然多方主体博弈的焦点和筹码在于“信任”,但是谣言炒作、污名化等负面方式只会加深公众对于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进而导致社会整体信任的衰减。从更长远角度来看,这并不会加深社会对于炒作主体的信任,反而还会加速社会的离散化和风险化,最终将会对依赖于信任机制的各主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相反,公众同时对各主体均产生正向信任,政府、媒体、他国平台等主体之间形成相互支持、达成信任的正向循环,进而推动社会整体信任的正向提升并非不可能。

回溯到问题本源,导致跨国数字平台与他国主体之间形成尖锐对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是平台垄断性和公共性之间的二重性矛盾。

平台对信息、数据、用户等资源的调用是无国界、共享的,但平台的所有权却是私有的、垄断的、可追溯地理范围的。在跨国语境下,当该矛盾进入到了地缘政治的框架当中,平台垄断性和公共性共存的矛盾则更被进一步激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多方主体之间的矛盾。平台垄断化使得数据、用户等数字资源有了明确的所有者,指向了明确的国家 and 地理范围,当特定国家的公共性资源汇聚和集中到具体、明确的他国企业时,国别之间的资源差异、国与国之间的信息霸权差异则会客观地将各国卷入到信息地缘政治的对立框架当中。随着数据资源在社会生产当中的地位提升,跨国数字平台的战略价值只会更为突出,各国对于平台控制的争夺也只会更为尖锐。与此同时,跨国数字平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对于国民认同、国家主权等地域性概念天然地存在一定的张力,这更使得他国多方主体天然地也对于非本国的跨国数字平台存在着警惕和敌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打破平台的二重性矛盾,这样的对立与冲突只会更为激烈,将会给国际社会整体带来更大的风险。

因此,在未来探讨更为灵活、更适应全球化的平台所有制模式是相当必要的。这样跨国数字平台才能有机会冲破信息地缘政治,真正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新生产力,而不只是作为各国盲目争夺的“新石油”。

四、跨国数字平台的未来与风险应对

从前文分析来看,各国对于跨国数字平台的敌视既有大国博弈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平台二重性在跨国语境下进一步激化的一般性原因。一方面,各国对于 TikTok 等中国跨国数字平台的敌视源于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的阵营选择,受到地缘政治、同盟压力等多方面国际关系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平台模式垄断性和公共性的二元矛盾在跨国语境下充分暴露,也反映出

了当前平台模式与全球生产关系之间的错配。为了应对风险,有必要充分认识到危机来源,整合多方资源加以应对。

(一)破除技术“无国界”迷思,充分认识风险的威胁和根源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简单地通过品牌危机、跨文化冲突等商业、文化等术语去界定跨国数字平台所面临的舆论风险,已经无法解释风险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也无助于帮助平台摆脱危机。

掩盖在“自由、中立、无国界”的技术神话背后,由于商业逻辑与技术逻辑的相互交织,当前的大部分平台仍然无法摆脱公共性与垄断性二重性矛盾的限制。在这一矛盾的限制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平台不仅无法摆脱地理属性的标签,其跨国界、去地域的扩张动力反而进一步使其与输出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剑拔弩张。基于跨国数字平台在信息地缘政治当中的特殊性来看,只要平台公共性和垄断性的二重性矛盾仍然存在,那么平台面临的舆论风险就不可避免,而这一风险也并非平台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完全摆脱的。

在未来,随着平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入,跨国数字平台的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只会越来越高,其所面临的舆论风险只会越来越危险和严重。平台模式本来就削弱了平台自身对于自身形象的控制力,其在信息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使其所面临的舆论风险更为特殊、复杂,这也要求平台有必要更为清晰地认知所面临的风险、更为综合地考察在社会和国际当中的地位、更为多元地整合社会关系,这样才能帮助自身真正地走出风险与危机。

(二)重视平台的公共性,发挥平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连接作用

从根本上看,风险的核心诱因在于平台垄断性与公共性之间的二重性矛盾。如果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这一矛盾,那么跨国互联网平台将永远无法真正摆脱舆论风险对其未来经营与发

展的威胁,信任危机的阴霾也将会始终笼罩在跨国数字平台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理想化的平台模式之间具有极强的共通性。在未来,两者或能互相成为彼此的良性发展路径,这也或许能帮助平台真正找到一条协调二重性矛盾的真正出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中国针对国际关系所提出重要构想,其主张超越国家身份、升级合作共赢、塑造共同认识。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被视为是理想条件下平台模式良性发展的标准方向。如果一个平台真正能超越目前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那这一个平台事实上摆脱了垄断性与公共性的二重性矛盾,走入了技术乌托邦所构想的去中心化的未来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主权与跨国数字平台之间的天然矛盾才能真正被消解,平台也才能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其本身的舆论风险与危机。

跨国平台在跨国沟通、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高度协调能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给出了一个切实的解决方案。自构想提出以来,更多研究者主要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对构想进行细化和阐释,忽略了跨国数字平台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④然而,从实践来看,跨国数字平台在全球的产业融合、认同塑造、秩序重塑等方面展示出了巨大潜力,这已经初步勾勒出了人类命运共同的未来蓝图。面对当前的二重性难题,如果未来的平台发展能充分地整合和吸收公共性逻辑,强调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的责任和角色,那么平台与他国主权之间的天然对立或许能有真正消解的一天。

(三)重视“信任”,加固和保障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基础

真正消解跨国平台的二重性矛盾,仍需较为漫长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而从更短期、更务实的视角来看,如果平台要从特定的危机中突出重围,则需要充分把握博弈的核心本质。换句话说,跨国数字平台更需要重视用户的信

任对于平台的关键作用,也需要在用户信任的维持与管理上付出更多努力。

舆论战、污名化等舆论手段的核心筹码在于用户对于不同主体的信任。他国主体对于跨国平台进行攻击的核心正是因为跨国平台在跨国语境下获取信任天然存在着更大难度。但如果用户对平台有着充分的信任,那么舆论手段对于平台造成的影响则会减弱。在充分的信任之下,用户不仅很难被负面舆论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通过去污名化、舆论对抗等方式对平台自发地进行维护。事实上,TikTok 封禁事件中就不乏有 TikTok 用户主动通过其他平台自发地对于 TikTok 的有关谣言进行反驳,甚至还有部分用户主动通过集会、联名信等方式对于政府的禁令进行直接反抗,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美国地区禁令的实施。可见,如果跨国平台能够充分掌握和管理用户的信任资源,是有可能帮助其抵御或减少特定危机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仍以 TikTok 为例,设立监管委员会、分离

和迁移服务器数据、成立信任与安全团队、更改股权结构等 TikTok 官方在事件后的补救手段虽然并没有有效减弱他国各主体的主动性舆论攻击,但是却在很大稳固了其核心用户对于平台的信任。在 2023 年的新一轮舆论博弈中,TikTok 也加强了与媒体合作并且还在听证会等场合更加重视品牌官方话语、官方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因此,2023 年初在美国本土的舆论博弈中,TikTok 所受到舆论影响显著减弱,甚至其 CEO 周受资还斩获了一大批粉丝和关注,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信任管理的重要性。

但从长期来看,未来信息地缘政治中的针对平台的舆论博弈仍以更为复杂、多元的形式继续进行,其关注焦点、竞争形势、影响范围也将随着时代变迁发生改变。对于跨国数字平台而言,要想真正从根本上摆脱舆论风险,仍需要从其风险的核心源头出发,充分协调平台模式中的二重性风险,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对平台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赋能。

【责任编辑:张毓强】

注释:

- ① W. Miao, D. Huang, Y. Huang. *More than Business: The De-Politicisation and Re-politicisation of TikTok in the Media Discourses of China, America and India* (2017–2020).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vol. 186, no. 3, 2021. pp. 13–14.
- ② 沈伟、靳思远:《网络空间博弈时代跨国科技企业面临的公私矛盾及应对——以抖音(TikTok)为例》,《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72–74页。
- ③ 戴淑婷、宋黎磊:《欧美科技制裁协作的动力与分歧:基于欧盟的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第101–106页。
- ④ 李彪、高琳轩:《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理论依归与路径选择》,《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2期,第12页。
- ⑤ 任孟山、盛子晴:《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地缘政治学:澳大利亚与“脸书”之争》,《现代传播》,2022年第7期,第144页。
- ⑥ 王波、李墨瀚:《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采取经济制裁型政治行为的动机分析——以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为例》,《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2期,第128–136页。
- ⑦ 温旭:《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1期,第108页。
- ⑧ [美]丹·席勒、翟秀凤等:《信息传播业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2期,第16–17页。
- ⑨ 万立良:《美国对华舆论的战略叙事机制及中国国际舆论斗争叙事体系探赜》,《边界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第103页。
- ⑩ 王沛楠:《TikTok 听证会:国际传播中的跨境数据与网缘政治》,《青年记者》,2023年第9期,第103页。
- ⑪ 王坤沂、张永峰等:《中国互联网平台市场垄断:形成逻辑、行为界定与政府规制》,《财经科学》,2021年第10期,第58–62页。
- ⑫ 余聪:《智能算法与信任资本:一个平台资本主义本质审视的向度》,《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11期,第63–67页。
- ⑬ 田佳勉、沈蕾等:《网络共享情境下平台企业品牌价值共创及策略研究——基于顾客产消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2期,第131页。
- ⑭ 张继龙:《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171页。

(作者陆泓承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苏晖系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党委书记)